

放言集

(外一编:杂拌集)

上册

马沛文



封面设计:澄 澜

责任编辑:大 江

ISBN 962-450-515-2/D • 40096

定 价:22 元

1136472

□ 60

< 6:上 >

放言集

外一编：杂拌集

上册

马沛文

徐州师大图书馆

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22206133

封面图像是法国雕塑家罗丹的雕塑名作《思想者》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放言集 上册

著者：马沛文

出版发行：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九十三号

电话：六七〇六六三三

传真：六七〇一三八二

定 价：人民币二十二元

一九九六年四月初版·香港

ISBN 962-450-515-2/D · 40096

放

言

集

加 印 絮 语

(一)

《放言集》还要加印，这是绝对始料不及的。不，不是始料不及，而是压根儿不曾料过。

记得1995年8月16日，《放言集》的印制要签合同了。我的挚友、也是印制《放言集》的代理人袁成兰女士来电话问我印多少？我胸有成竹地回答：“印500部，全部送人，送完为止。”听得出，她大吃一惊，说：“什么？只印500部？还全部送人？那不行。你花了那么多钱，干么印那么少？送人送那么多？这书稿我全部看过，它讲的是真话，会有人爱看，有人愿买的。况且，印500部费用是16500元，印1000部，只加3500元，为什么不印1000部呢？”

我信任自己的代理人，立即同意，说：“听你的，就印一千部吧！”

可我接着又犯了犹豫，这书能卖得出去吗？第一谈的主要是理论问题，比较枯燥，爱看这种书的人有多少呢？第二书价那么高，谁肯花那么多的钱买一部书看呢？于是，电视连续剧《半边楼》里的那个镜头不断在眼前出现：一位教授出了一本书，答应了出版社自销3000册的条件，可又销不动，他就坐在成堆的书上伤心落泪。

我想，不行，得“未雨绸缪”，决不能蹈那位教授的复辙。于是，努力扩大赠书范围，但只能扩大到650人左右。

怎么办？

突然，眼前一亮，有了，万一销不动，就赠给图书馆吧！各省

市、各地市、各大学，何愁赠不完呢？而且，赠给个人，他也可能不看，扔在一边，说不定哪天还当废纸卖掉；赠给图书馆，起码会保存起来，总能碰到被借阅的机会。这才恢复了心理平衡。

(二)

《放言集》是6月17日开始发行的，很快，朋友们的信和电话就纷至沓来，而且，反映出乎意料地热烈。现按先后次序摘录信和电话的部分内容，以告读者。

6月21日，山西省委党校副教授吴敏来信说：“今天上午9时从传达室收到您寄来的书，我不由自主的放下了手头的其他事，像被一个巨大的磁场所吸引一样，深深地被‘吸’入您的书中。……从您的书中，我看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看到了一个大写的人的铮铮骨气，也看到了一种时如大江东流，时如春花鲜丽的文笔所饱含着和喷涌着的不尽才气。同时，我也感到，这样的一本好书，这样一本真正贯彻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好书，竟然不能出版发行，这实在使人可悲、可叹。”

从6月22日到7月18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甘肃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本法连发三信，说：“书我已粗读了一遍，激动不已。”又说：“后又花去三天时间细读一遍。对您，虽是良师益友，但真正认识还是通过对这套书的学习。您的一身正气，您的直言勇气，您不虚美、不隐恶的品质，您的认真、严谨，您的博学多识，您的畅达文笔，无一不值得我学习。”还说：“您是位真人，写的是真话，做的是真文。”

6月23日，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鸿烈来信说：“接书后如获至宝，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拜读大作，一口气读了8小时，读完了大作的主要篇章，现在给您回信，已是6月23日凌晨3点，能如此吸引我的书是很少的。”又说：“如此有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且文字

流畅的论著，国内竟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被延误了8年时间，最后还是用香港的书号、个人掏钱出版的，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又感慨良多。”

6月24日，新华社原江苏分社社长尤淇来信说：“来书我已拜读了几篇，十分佩服你的胆识和犀利的思想。”

6月25日，原安徽省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现省政协常委、美学家郭因来信说：“今年的一大喜事是意外地收到您寄来的《放言集》。我迫不及待地翻看《放言集》中您写的序、跋、后记、书的目录，又根据目录看那些我最想先看的大文。”“阁下反左批左旗帜鲜明，文笔犀利明快，读来实感过瘾。”“我拟在最近一个时期，放下手头一切可缓办之事，而把《放言集》从头到尾读完。”

6月26日，作家叶永烈来信说：“寄来大作两册，接连数日深夜拜读，收益匪浅。这两本书，其实可稍作删节，用《防“左”备忘录》作为书名在国内出版。……此书批‘左’，颇有力度、深度和广度。”

6月27日，山东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研究员邵景均来信说：“收到书后，便迫不及待地读起来，大有爱不释手之感。这部著作的面世，是可喜可贺的大事……我相信它必将以其特有的价值，载入当代中国思想史。”“有些书，一出版就成了垃圾；有些书，凭借权力可以红火一时，也不会长久留世；这部书将永垂青史。”

从6月29日到7月17日，四川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副所长的洪韵珊连来三信，长逾万言，激情奔涌地，欲罢不能地反复畅叙她读后的感受。信上说：“读您的书简直是一种极好的精神享受。文章写得有理有据，驳斥谬论时，娓娓道来，层层剥片，驳得对方体无完肤，使人感到痛快淋漓，不禁为您拍案叫绝”又说：“您的文章……文笔锋利，逻辑严密，行文流畅，引经据典，比喻贴切，知识广博，可读性强，特别是那些引自古今中外名著、名家的名言、警句、例证，不仅为文章增光添彩，而且为读者开

辟知识的天地。”还说：“我认为这部书的价值非凡，不仅在于它的学术价值，而且在于它的思想价值，精神价值，人文价值。您的书是精品，是上乘，是传世之作。”最后说：“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是由作者亲自赠送给我的许多著作中最好的一部，也是我从头到尾、逐句逐篇细细读完的唯一的一部”。

7月3日，原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余焕春来电话说：“信和书都收到了，开始看您的信，我想，花那么多的钱出一部书，不值得；以后，我翻读了你的书，又觉得很值得，我要买四部，送给我的朋友”。

7月3日，中国音协理论委员会委员曾刚来信说：“你的《放言集》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或不会说的话，实践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章尖锐、泼辣、鲜明、生动，开思想、理论文字之一代新风。我相信，书稿经得起时间检验，会留传后世的；凡我中华民族正直的史家，会秉笔直书，放言赞赏。”

7月4日，人民日报原国内政治部副主任傅真来电话说：“收到《放言集》非常高兴。这书有阅读价值，又有保存价值。你不送给我，我到书店看到也会买的。我已把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那篇读了，讲得很有道理嘛！”

7月5日，原东北电业管理局副局长、曾对我参加革命有过影响的老同学张润民来电话说：“热烈祝贺你的《放言集》的出版，我正在阅看，初步印象是，你的观点虽然尖锐，但那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驳不倒的。”

7月初，原青海省委宣传部长午人来信说：“接到文集，初读了几篇，吸引力很强”，“《放言集》是该读的一部好书。”

7月9日，人民日报高级记者王金凤来电话说：“你的《放言集》我差不多快看完了，我觉得很好，我要买5部，送给我的朋友。”

7月10日，原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学沛来信说：“我如饥似

渴地打开书本，实在爱不释手，倍感亲切。这样的著作要自费出版，真是令人困惑。”

7月10日，接原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作家延泽民电话说：“你的《放言集》虽是理论文章，却有很强的可读性。我的视力极差，不用放大镜不能阅读，因此，我已很少读书了。可是，读《放言集》，有时读得放不下来”。

7月10日，《金陵晚报》记者丁邦杰写来1700字的长信，纵谈他的读后感，说：“大作《放言集》经袁成兰老师转寄来，晚生请假一星期，闭门拜读三遍，感佩之至！南京日报评论处长陈义正同志也看了一遍。我们都认为这部力作实在沉重，是眼下在新华书店绝难购到的好书。就其字里行间表现的非凡胆识来说，您的宏篇巨制在海内想必没有一家出版社的‘老总’有胆敢出，所以历时七载，受挫四次，不是什么怪事。‘媳妇’嫁不出去，毕竟没有老死闺房。我为她最终适得其所庆幸，亦为马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界所作贡献深表敬意。”“读了《放言集》，深感正义、学识、胆略、责任感尽在毅中，鞭辟人里的灼见真知随处可见。”

7月12日，光明日报原驻江西记者站长、高级记者雷良钧来信说：“喜收《放言》，看到仁兄一片正直心迹，有出版流传后世之价值。”

7月17日，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方汉奇来信说：“大作的序、跋已拜读，正文也看了些，觉得是一部好书，好在篇篇都是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实事求是的真情文字。没有应景趋时（趋时并不全错）以新老八股欺世媚俗的平庸之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出以公心的爱党爱国之情。是今天的屈原写的今天的离骚。其文其情，可对天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也是可以留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此外，文笔也很好，思想、感情、文彩，三俱佳。如此美文，而经历如此，实在令人感慨。”

7月24日，光明日报高级编辑陈英茨来信说：“这几天没有干别

的，都是读你那两本书，头一天夜里一点醒后，读到晨六点。”

7月31日，接到中央党校八旬高龄的姬也力的电话。1937年到1938年，他对我参加革命有过重大的思想影响，五、六十年代，他曾任过大连市委书记，东北局财委副主任，“文革”结束后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他在电话中说：“你的《放言集》，我整整花了三天时间，全部看完了，很好。我不是搞理论的，但你表达得那些理论观点，我在实践中有深切体会”。

8月4日，人民日报高级编辑黄植来信说：“收到你赠与的新著《放言集》，已读了好几篇，它不同于常见的一般旧作的结集，是用锐敏的观察和犀利的语言，记录了过去十年中学术上理论上影响迄今的若干大事，在在有发人深省之处，定会受到社会上的广泛关注。”

8月5日，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缪宜琴来电话说：“你的《放言集》写得非常精彩，我连夜拜读，爱不释手，时而为你的幽默笔调发笑，时而又为你揭露的那些事实生气。我们这一代人，都程度不同地有过风风雨雨、坎坷坎坎的经历，你的书讲出了大家想讲又不知道该怎么讲的话，读起来格外亲切，文章又写得有理有据，实事求是，能激起读者喜怒哀乐的感情共鸣。”

8月10日，原人民日报驻上海首席记者、高级记者章世鸿来信认为，《放言集》“立论准确、鲜明、尖锐，一针见血，又富有逻辑力量，更有感染力，令人感到心灵深处有些颤抖。现在，老记者出书的不少，但真可以一读的很少。似你这样具有理论勇气的记者著作，我还是第一次读到，你经常抛出‘险球’，我也有惊险感！”又说：“你记录的是中国大转变时期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的真实面目，你提供的是历史文献，大可以治疗健忘症。”还说：“我最近也参加过一些理论讨论会，但每次都很失望。……我的印象是：中国的理论界可说苍白无力，因而，读你的书感到耳目一新”。

8月10日，接中央党校两位教授的电话。王贵秀说：“你的《放

言集》我正在拜读，印象是材料丰富，许多观点也很深刻，很好。”董新民说：“《放言集》的下册，我已读了一半，感到很受启发，很有价值。”

8月15日下午5点接新华社高级记者潘荻电话说：“我两点从外面回来，看到您的《放言集》，没有休息，一直读到现在。我认为您出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书。”

8月19日，看到光明日报“家庭周刊”主编夏欣的信说：“文集十分精彩……我将篇篇精读，细细品味”。

8月20日，碰到光明日报主办的《书摘》主编李春林，他说：“《放言集》的上册我已看完，有时看得惊心动魄。”

8月27日，人民日报高级编辑、原人民日报出版社副社长郭龙春来信说：“此书的出版，使有关真理标准等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些文章得以流传，这是对理论，学术方面的贡献，值得祝贺！”

8月31日，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来电话说“《放言集》我正在读，您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令人敬佩。我觉得材料很珍贵，简直有点像十几年来我国理论，学术方面的编年史。”

10月19日，漫画家钟灵来电话说：“您的《放言集》已经拜读，我的评语是四个字：正气凛然。”

陕西的一位老新闻工作者薛征东于10月23日来信说：“通读了《放言集》上册，真是越读越感到过瘾、痛快，言人之所不敢言，说真话，求真理，这是最了不起的。这样一部好书稿，竟没有一家出版社接受出版，一波三折，要出国求生，简直是历史笑话。”

1月5日，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丁启阵来信说：“您的大作《放言集》我早已收到，并捧读一过。您的文章站得高，见得远，又有性情，有思索，对我震动很大。我为这样的好书出版却如此之难深感不平。”

1月6日下午，西安一些热心的朋友，还开了十多人参加的小型

会,议论《放言集》加印后的发行问题。1月11日,接到与会者之一、离休的老医务工作者贺念祖的信说:会上“凡是读过书的人,异口同声赞扬这部书是不朽的传世之作。你是千百万有正义感的人们的代言人,为人们说了郁结胸中长期想说而不知如何说的真心话,书的面世是时代的正义的呼唤,它的影响将随时间的推移而愈益广泛、深刻。”

我也接到一些素昧平生的读者的信,表达他们读了《放言集》的感受。

陕西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张敏生9月4日来信说:“读过您的书就像见到您本人一样,从心里由衷地敬重您,热爱您的文章。”

9月6日,《中国软科学》杂志高级编辑杜虹来信说:“您的大作《放言集》不仅文彩洋溢,而且内容深邃,还具有史料价值。”

《陕西农业全书》编辑部主任张国宁在9月14日的信上说:“《放言集》我很喜欢读,可惜如今很少看到这样好的文章。……将你书中一些文章复印给党校同志阅读,大家都说好。”

兰州大学马列主义系学生丁松虎于10月14日的信里写道:“我读了好几遍《放言集》……启发了年轻读者怎样做人。正如您在《杂拌集》第396页所言,独立人格、独立意识、独立思考,是人类个性解放、个性发展的标志,是现代化人才应该具有的起码素质。……读了您和陈宗立老师撰写的《法与权、正与邪的一场大搏斗》一文,我更加明白了:做记者,就要做您和陈老师这样的人民记者。……您写的《新闻工作指导思想的一次失误》和《办好党报与独立思考》充满了新闻思想的活力,我在一些新闻理论刊物上还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有个性的文章。”

《放言集》封面的设计和印制,也受到赞扬。我的堂妹,也是我的学生马心如7月12日来信说:“《放言集》书皮白净、光洁,红色的标题字和您的名字那样醒目,封面还有罗丹的雕塑名作《思想者》,

既意义深长，又美观大方，叫人爱不释手。”

等等，等等。

有人也许看着这些赞美之词感到不耐，说，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为自己做广告吗？是的，的确也包涵着做广告的意思。商品社会就是广告社会，《放言集》也是一类商品，为什么忌讳做广告呢？

国内的正式出版物，堂而皇之地摆在书店里、书摊上，招徕顾客，不也有做广告的意思？许多新出版的书，在报刊上既做报道，也发评论，不也是在做广告？更不要说登在报刊、书籍上的广告栏里的新书介绍了。

《放言集》由于国内找不到出版单位，才不得不用香港的国际统一书号问世。出于谨慎，我既不允许上市出售，也不同意报刊评介，连有些热心的朋友想拿到会议上推销，我也婉谢。只是乘加印的机会，把朋友们对《放言集》的反映披露出来，这已不是我在“跋”中所说的“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而是“老王卖瓜，买者齐夸”，比起一般的报刊登载的新书广告更要客观一些，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但是，我所以这样，还有比做广告更深的用意。

古话说：“空谷足音，颺然而喜”，读着和听着朋友们对《放言集》的完全理解和充分肯定，我感到在政治观点，理论观点上，他们是我的“知音”，我的知己，就像徘徊在绝无人烟的荒谷之中，突然听到“足音”一样，自然格外欣喜。但是，面对他们的如此赞许，我并没有飘飘然，昏昏然起来，我还有起码的自知之明。比如“传世之作”，比如“永垂青史”，比如“今天的屈原写的今天的离骚”等等，我马沛文不配，我的《放言集》同样不配。

《放言集》中不少观点，人们所以觉得新鲜，那是因我批评的许多现象十分陈旧，甚至极端腐朽的缘故。随着我国社会的大进步，人们观念的大更新，《放言集》中那些观点也将成为“明日黄花”。

只要我党、我国能够加快改革的速度，我倒希望《放言集》的速朽，则党幸甚、国幸甚、民亦幸甚矣！何需“传世”，更何能“永垂”？至于那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我连想也没想过去望其项背。

我坚信我的这些朋友，都是刚直不阿的，既不阿世，也不阿人，他们如此赞美，只是读了《放言集》之后向朋友直抒胸臆而已。由于有些朋友对我的做人、处世、为文的格外了解，更由于对《放言集》的坎坷经历的特别同情，他们在写信和打电话时情绪相当激动，这也是事之常理，人之常情，大可不必去挑剔文字、语言的分寸。我之所以照录原话，既说明我对这种友情的特别珍重，也表示我对朋友们理解我、支持我的衷心谢忱。

(三)

《放言集》当然存在着不足、缺点甚至错误，朋友们的来信中也有所涉及。

洪韵珊7月13日的信中写道：“您书中我认为唯一需要斟酌处，是您两次谈到马克思所处的环境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尽管过去是一直这样看的，但现在看来，马克思所处的环境，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不成熟阶段，资本主义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二战之后，才进入了成熟阶段。”

这是一个失误，洪韵珊的意见是正确的。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它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把马克思所处的环境看做是成熟的资本主义，是同把进入垄断时期的资本主义看做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这种错误观点密切联系的。直到现在，资本主义不论是它的政治统治还是经济发展，还处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如果把那句话改成“马克思所处的环境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时期”，也许较为恰当。

还有，丁邦杰在信中也指出：“我以为您对‘左爷’的批驳，再多

一点历史的分析就更深邃了。如果从单篇文章看，这个要求就有点求全责备……然而您要奉献给社会的是几十万字的一部厚书，又是集中90%的火力批左的。只有使人们了解极左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我们才能找到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土地繁殖、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成因。同时，才能使我们了解左的顽劣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以防我们这个民族对历史无知的最大惩罚就是历史的回复”。

这个批评也是中肯的。我在那么多篇批左的文章中，几乎没有具体触及到它的历史根源，这是《放言集》内容上的一个缺憾。当然，在中国要彻底地完成批左的重任，用这些年人们习惯的说法，是个很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众多的左祸经历者、受害者，以及“迷途知返”的左祸制造者，加上众多学术理论工作者齐心协力方能完成。

郑本法10月1日来信中，对《放言集》下册249页的一处提法：“如果省委允许省人大实行监督，允许舆论实行监督，两案的问题早已解决了”表示异议，他认为，人大和舆论对党组织的监督是理所当然的，而不能靠“允许”，因为，“允许”是靠不住的，如果人大和舆论能实行有效的监督，两案就不会发生，而不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我觉得言之有理。

《放言集》还有一个严重缺点，就是技术性错误太多，校对的质量太低。新闻出版署规定，出版物的错误率，每万字不得超过一个，否则，就是不合格产品。《放言集》共65万字，我在加印前的改样上改动1220处，其中标点用得不正确或不规范的即达679处，就是说每万字的差错近19处。这多么使人丧气。可这既不能怨天，也不能怨地，只能怨我们自己，因为这部书的责任校对就是我和我的老伴姚堤。

虽然我们认为校对这部书稿是尽了心，竭了力的，不算工厂做过的初校，我们俩就校了六遍，所下功夫超过三校就算终校的一

倍，原以为质量会比较好，没承想竟会如此糟！

这么多错误，是谁发现的呢？一要感谢甘肃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本法，他出于对《放言集》的厚爱，听到要加印的信息，像他10月1日来信中所说的“以‘十目一行’的功夫进行勘误。”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有时废寝忘食，甚至通宵达旦。他的勘误表上列出差错1175处。二要感谢包头供电局工程师杨爱华，她是我女儿的好友。我赠她《放言集》，是因为我们交往颇多，出于礼貌，这样的书，她是否会看，并未考虑，想不到她对此书竟有浓烈兴趣。白天忙于工作，《放言集》就成了“夜夜读”的东西，而且读得很细，在她寄来的勘误表上列出差错195处。三要感谢长期担任人民日报检查组组长、离休干部武迎山，他检查出的差错也有187处。当然，他们三位检查出的差错，有许多重复的地方，也有少量误检之处，现在乘加印的机会一一改正，庶几可以摘掉“不合格产品”的帽子，也是一件快事。

有几位朋友，在充分肯定《放言集》的同时，也提了点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有些话讲得太尖锐了些，有些事说得太直白了些，因此，伤害的人也多一些。虽然没有明确地指出这是缺点，但那意思是清楚的：如果行文不那么尖锐，叙事不那么直白，伤害的人少一些，《放言集》岂不更完满一些？

我反复考虑之后，认为这不应该是《放言集》的缺点，而是《放言集》的特点。

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倡要有“尖锐、泼辣、鲜明”的文风，反对写文章像“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邓小平也曾说过：“拨乱反正语言必须明确”。《放言集》的绝大部分篇幅，是批评积重难返的顽强表现的左的路线的，是企图在路线问题上拨乱反正的。这就应该充分发扬毛泽东提倡的“尖锐、泼辣、鲜明”的战斗文风，应该努力实践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语言必须明确”的正确指示，尖锐何妨？直白何害？